

李鸿章在日本遇刺始末

1895年3月,李鸿章以清政府全权大臣身份赴日本马关议和。此前,北洋水师全军覆没,清政府已无力再战,求和成为唯一出路。然而,出使敌国向来凶险,李鸿章却“殊坦然,不以为危”。他一面谈判,一面牵挂国内家眷的安危,发电报嘱咐在天津的“家眷速行”。不料,威胁并非来自远方,而是近在咫尺。3月24日下午,李鸿章在返回寓所途中遭日本刺客枪击,左眼下方中弹,血染官服。这一枪不仅震动日本,也影响了《马关条约》的谈判进程。

突遭枪击

1895年3月24日,日本马关,春光明媚,枝头樱花将开未开。下午4时40分,李鸿章照例乘轿从谈判地点春帆楼返回寓所引接寺。尽管已是第三次会谈,窄窄的道路上仍是观者如织。经过一家杂货店门口时,路旁突然有一名衣着褴褛的年轻人越众而出,拦住去路,左手按住轿杆,右手从怀中摸出手枪,抬手便向轿中扣动了扳机。

当时李鸿章的眼镜戴得稍低,子弹打碎左边镜片,击中左眼下方。顿时,血如泉涌,溅满他的一品官服。这身血衣后来被他带回国内,去世后保存在墓地的享堂里,其中的黄马褂在1928年的战乱中丢失,另一件长袍也在日

军攻占合肥时遗失。

轿外乱成一团。轿夫吓得不敢前行,护卫的日本警察驱散行人,将轿子拥入引接寺。生死一线之际,李鸿章不失大臣气度。有目击者回忆,他被刺后“立即以右手的长袖掩住伤口,并无震惊神色,态度泰然自若”。他的顾问科士达也记载:“总督没有被枪击吓住,而是端坐不动,冷静地要一个轿夫给他手帕止血。”刺客开枪后企图逃走,但被宪兵当场擒获。他的凶器是一柄五连发左轮手枪,弹膛里尚有4发子弹。讽刺的是,行刺地点正在日方为保护李鸿章安全而设立的宪兵分队驻地门前。

全力救治

清政府全权大臣被刺,不啻为马关的一场地震。事发后,“日官来问伤状者络绎不绝,寝室前后甬道游廊皆满”。事发时,日本外相陆奥宗光正与李经方(李鸿章的养子)商议谈判事宜,闻讯立即让对方回去照顾父亲,自己先给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报讯,随后一同前去慰问。

根据国际法,使节人身安全应受所在国保护。李鸿章身受一枪,令日本在外交上极为被动。伊藤博文与陆奥宗光沮丧地表示:“此次事件,比起一两个师团被打败更让人难堪。败仗还能够转败

为胜;而此次事件实在令人忧虑不已。”当天晚上,陆奥宗光致电驻外使节,让他们向各国通报情况并探听舆论。英、美、德公使均表示事件激起了欧美的恶感。俄国公使更是挑明:此前各国对中国求援只作应酬,如今中国有了充分理由,列强普遍谴责日本。

为谋求补救,日方首先在治疗上下功夫。李鸿章使团原有两名医官——法国医生德博施与北洋西医学堂总办林联辉。日方决意挤开两人,将治疗抓在自己手里。伊藤博文致电日本陆军参谋次长,要求速派陆军军医总监石黑忠惠与佐藤进到马关。石黑对医治枪伤经验丰富,佐藤号称外科手术无人能出其右。两人连夜从广岛宇品港乘船出发。

次日上午,两人抵达马关,与伊藤、陆奥会面后立即赶往引接寺,竭力标榜为李鸿章治伤的诚意,他们谦恭地说:“定将如同我等父亲身受枪伤一般认真对待。”李鸿章握住石黑的手说:“我的治疗就托付给阁下了。”石黑多年后回忆,仍记得那一刻如释重负。他叮嘱佐藤,不要让德博施和林联辉有露脸的机会。正如石黑所说:“我的使命一半事关外交,一半属于治疗。”稍后,日方又派来东京帝国大学教授、德国外科医生斯库里巴。

鉴于李鸿章年高体衰,不宜开刀,子弹始终没有取出。同年11月,德国物理学家伦琴发现X射线。次年李鸿章出使欧美时,慕名在德国柏林拍摄了一张X光片,嵌在额骨中的子弹清晰可见。他本想动手术,但因医生没有把握而作罢。这颗子弹一直留在他身体中,直至盖棺。

终身伤疤

为讨好李鸿章,日本各界挖空心思。天皇下诏称“深以为憾”,朝野上下曲意奉承。各界人士纷纷慰问,引接寺一时车水马龙。慰问函电纷至沓来,致意者有东京名流,亦有北海道村民。大阪《朝日新闻》记者西村天因因汉文素养好,被人请去捉刀代笔十几次。日本各家报纸也纷纷痛斥凶手为“狂汉”“国贼”,著名政论家福泽谕吉大骂其为“不共戴天之国贼”。

然而,两天后福泽又提醒日本人不要因“小义侠”而忘记“大义侠”,声称政府若因此手下留情便是“宋襄之仁”,应当强硬一贯。陆奥宗光对此有段辛辣评论:“这些人昨日还沉浸于战胜狂喜,咒骂李鸿章,今日突然痛惜不已,与其说表示痛惜,不如说畏惧外来非难。”

李鸿章也看得明白,在给国内的电报中冷冷评论道:“该国上下礼谊周至,不过敷衍外面。”

此时,尽快惩处凶手自然也是应有之义。刺客名叫小山丰太郎,时年27岁,为人放荡无赖。他小学毕业后只念了几个月中学,后进入庆应义塾(日本私立大学)就读,亦中途退学。行刺前他携带一份“毙奸趣意书”,认为李鸿章是破坏东洋和平的元凶,不应让其来日本。在法庭上,他举出行刺理由:因李鸿章令天皇忧心;破坏和平;为战死日本人负责;议和对日本无益;以及“战胜国未见敌国首都便收兵乃不名誉之事”——这最能体现当时日本的战争狂热。

为尽快平息舆论,对小山的审判相当快捷。案件被认定适用故意杀人未遂,小山被判处无期徒刑。据记载,伊藤博文曾两次向裁判长施压要求判死刑,但裁判长以司法独立为由拒绝。

小山后来被押解到北海道服刑,两年后因大赦减为15年徒刑,1907年假释出狱。他在狱中写成《活地狱》一书,序言写道:“我之罪,乃因思国家之真心深切也。”1938年,他又发表回忆录《旧梦谭》,原原本本回顾了刺杀李鸿章的前因后果。

李鸿章遇刺后,照会日方因伤无法出席会谈。日方采取了缓兵之计,复照称需奏明天皇,“难免稍有担延”。原本即将展露的匕首,又暂时藏了回去。

李鸿章遇刺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谈判态势。日方因理亏而有所收敛,后在赔款数额等方面稍做调整,李鸿章也利用此事在国际上争取同情。然而,这一枪终究未能改变马关谈判的结局——只是让日本在外交上多费了些手脚,让李鸿章脸上多了一道终身的伤疤。

据《昂贵的和平:中日马关议和与研究》吉辰/著

达·芬奇是“拖延症患者”

达·芬奇是公认的西方艺术巨匠,但也是一位严重的“拖延症患者”。他创作一幅作品通常要经历漫长的时间,总是让下订单的“甲方”十分恼火。他的名作《最后的晚餐》用了3年时间才创作完成,《蒙娜丽莎》耗时4年才勉强成稿。因此,达·芬奇的传世作品并不多,直

到他去世时,手里还有作品未能完成。创作时的达·芬奇总是在琢磨,不仅从艺术的角度琢磨画作本身,更是从科学的维度钻研多个领域。这种超乎极致的完美主义也让达·芬奇本人苦恼万分,他曾经反思:“到底有哪些事情是完成了的?”

据《名人传记》一朵/文

